

整体对接:论中国与沙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孙德刚 王亚庆

摘 要: 沙特油气资源丰富,具有资金和区位优势;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具有技术和市场优势。中国与沙特建交 30 年来,两国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经历了能源合作伙伴、战略性友好伙伴和全面战略伙伴三个阶段,形成相互依存的整体合作关系。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 愿景”目标契合,两国合作受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东地缘政治剧烈变动和中沙优势互补等因素影响,具有顶层设计、全球布局、机制对接和多维合作的特点。展望未来,中沙关系的发展需处理好“中国—美国—沙特”大三角和“中国—伊朗—沙特”小三角的关系,统筹旧平台与新机制,加强中沙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中沙整体合作促进了东亚与西亚的互联互通,有助于亚洲大国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进而增强亚洲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中国与沙特;整体合作;中国中东外交;新兴大国

作者简介: 孙德刚,博士,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 200433);王亚庆,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 2018 级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20)04-0028-27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系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整体外交研究”(19AGJ010)和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中国参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港口建设的理论与实践”(19FGJB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阿拉伯世界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沙特是阿拉伯地区最后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迅速发展,战略合作层级不断提升。2019年中沙贸易额达780亿美元,沙特连续19年成为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自2013年以来一直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沙特最主要的石油进口国。

随着中沙合作的不断扩大和成果不断积累,两国已超越以往的“能源共同体”(在能源供需上形成相互依存关系)和“利益共同体”(在贸易领域形成相互依存关系),朝着构建“安全共同体”(形成安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命运共同体”(形成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的方向前进。2020年2月3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通电话,代表沙特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战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充分肯定中国为防控疫情采取的有力措施,高度赞赏中国在疫情防治工作中体现出的责任感。^①2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时指出,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沙特多次予以中方坚定支持,充分体现了中沙两国的真挚友谊和高水平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沙方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②截至2020年,中沙双方在能源、产能、装备制造、贸易、投资、金融、科技、人文、反恐、安全、政策沟通等领域的广泛合作进展顺利,彰显了合作的整体性。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建交30年来,为什么中沙关系持续升温,在“存量”(能源合作)的基础上,“增量”(高新技术合作)不断扩大,层级不断提高(从“战略石油伙伴关系”到“战略性友好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最终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的整体合作关系?本文以中沙官方文件为基础,从整体对接的视角分析2016年以来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动因、特点和战略基础,并对两国关系的前景进行展望。研究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再出发”,探讨中国与其他中东国家开展全方位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① 《王毅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中阿合作论坛网站,2020年2月4日,http://www.chinaarabcf.org/chn/zyhd/t1739908.htm,登录时间:2020年3月25日。

^② 《习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2月7日,第1版。

一、从单维到多维：中沙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程

中国和沙特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双方经历了战略猜疑、有限交流、整体合作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美苏冷战大环境的影响,中沙属于不同阵营,交集不多,互相了解较少,意识形态成为中沙双方制定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双方关系冷淡,沙特与中国台湾当局长期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 1955 年万隆会议上,中沙代表虽有初步接触,但双方关系仍然坚冰难融。

1966 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时任沙特国王费萨尔正式访问美国。他在同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交谈时指出“共产主义好比毒瘤,如果任其发展,最终将毁坏整个肌体。东南亚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美国在 1954 年就果断采取措施,众多美军就不必牺牲在战场上。”^①在中东地区,沙特认为共产主义的代表是以色列的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埃及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因为马克思是犹太人,纳赛尔是共产主义者,故共产主义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危险,且共产主义宣扬的“无神论”挑战了沙特作为“伊斯兰圣地守护者”的地位。沙特作为君主制国家,是共产主义运动“革命”的对象,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君主政权被推翻,加剧了沙特政府的安全焦虑和对美国的安全依附,故沙特支持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1971 年,在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时,沙特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一道投了反对票,成为当时中东 15 国中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沙特投反对票主要是由冷战背景下美沙特殊关系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的。

1979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 1980 年至 1988 年的两伊战争,使沙特王室在安全上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国,这为中沙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有学者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中沙防务合作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中沙于 1990 年 7 月实现建交。建交 30 年来,中沙伙伴关系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90 年至 2008 年,中沙成为能源合作伙伴,两国合作以能源合作为主。中沙建交是两国关系的分水岭。随着东欧剧变、两德统一以及 1991 年苏联解体,美苏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结构性冲突结束,中沙两国的政策几乎同时摆脱意识形态差异的束缚,现实国家利益诉求代替意识形态分歧,成为影响双边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21, 1966, 6: 25-7: 10 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4-1968*, Vol. XXI, Document 276.

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建交伊始,中沙贸易额有限,政治互信仍处于建构阶段,能源合作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基础。沙特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二位,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六位,世界上最大油田中沙特占两席;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沙特对华石油出口量逐年增加,为双方合作关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1999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沙特,成为访问该国的第一位中国国家元首,双方宣布建立“战略石油伙伴关系”。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中沙合作开始借助多边舞台。^①2006年1月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登基后首次出访便选择了中国,三个月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进行了回访,进而提升了两国能源合作的水平。

第二阶段是2008年至2016年,中沙成为战略性友好伙伴,双方合作具有经贸—政治二重性。2008年6月,中沙发表《关于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预示着双边关系从能源伙伴升级为能源+政治伙伴,两国合作再上新台阶。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2009年国家主席胡锦涛相继访问沙特,旨在进一步提升中沙政治合作的水平。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客观上对中沙合作起到了助推作用。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中沙经贸关系的发展迎来了新机遇。

一方面,能源合作仍然是中沙合作的重点议题。根据2008年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2008年至2010年,中国每天自沙特进口石油100万桶。^②在能源合作中,中国开始参与投资和开发沙特上游石油市场,沙特则参与投资中国石油的下游产业,如投资福建炼油厂。2015年两国签订《中国和沙特石油技术合作协议》。另一方面,中沙政治合作日益密切。“9·11”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认为中东恐怖主义的根源是“民主赤字”,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中东威权国家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宣称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全。小布什政府迫使沙特政府推动民主化改革。与此同时,美国以“民主”和“人权”为幌子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使中沙在维护政治安全、反对美国输出民主价值观方面凝聚了共识。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发生后,沙特第一时间向中国提供6,000

^① Phar Kim Beng and Vic Y.W. Li, “China’s Energy Dependence on the Middle East: Boon or Bane for Asian Security?,” *The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 3, No. 3, 2005, p. 4.

^② Abdulaziz Sager, “GCC-China Relations: Looking Beyond Oil — Risks and Rewards,” in *China’s Grow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Dubai: Gulf Research Center and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 2010, p. 3.

多万美元的现金和物资援助,这是中国政府收到的最大一笔海外单项援助。在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期间,沙特精心打造的“丝路宝船”是最具人气的场馆之一。^①

第三阶段是 2016 年至今,中沙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合作具有全方位性。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中沙战略性友好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这标志着中沙整体合作框架业已形成。《中沙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推进的背景下,中沙关系越来越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两国已成为彼此在全球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彼此关系,将对方便置于本国外交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向”^②。中沙整体合作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互访频繁,经贸合作不断密切(见表 1),高科技合作全面展开,安全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全方位合作既表现为合作领域的全方位(如政治、经济、能源、产能、安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等),又表现为合作区域的全方位(双边、三边、地区和全球)。

表 1 2008 年~2019 年中沙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贸易额	434	343	451	666	744	742	715	539	424	501	614	780

资料来源: Sinem Cengiz, “Saudi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the Post-Arab Uprisings Era: A Neo-Classical Realist Approach,”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14, No. 1, 2020, p. 62.

二、凝聚共识: 中沙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

自 2016 年以来,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短短五年时间里构建了整体合作关系,以中沙高级别联合高委会(下文简称“中沙高委会”)为机制,全面开展政治对话、务实合作、双向投资、人文交流与防务合作。尽管遇到内外部、主客观各种新挑战,但它们都是前进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可以通过机制创新和战略协调加

① 《做共同发展的好伙伴》,载《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19 日,第 1 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6 年 1 月 19 日,利雅得),载《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20 日,第 2 版。

以解决。中沙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战略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沙双方均辩证地看待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中沙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主张根据各自国情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推动渐进式改革,其对外政策的总体原则不会出现大的波动。沙特王室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使双方政治承诺可信度更强,可以根据双边关系的发展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促进“一带一路”与“2030 愿景”有机结合,且这种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对接、落实与推进有国内政治制度延续性的保障。中沙均有强大的国有企业,这成为支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依靠力量。从战略石油伙伴到战略性友好伙伴,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沙整体合作不断夯实。双方领导人根据上一届政府达成的共识不断推进,并根据实际需要拓展合作新领域,合作存量不断积累,增量不断扩大。

第二,中沙倡导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模式。中沙均是非西方大国,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发展模式不可能只有一种固定模式。1990 年柏林墙的倒塌被西方视为自由民主的胜利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冷战结束后,西方将欧亚大陆非民主国家视为“改造的对象”,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甚至将俄罗斯、中国、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中亚国家视为威权政体和异己。^① 西方认为,这些国家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背道而驰,故“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实行人道主义干涉。2010 年底爆发的中东变局(发生在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等),以及 2019 年发生的新一轮政局动荡(如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和黎巴嫩等),都被西方视为“中东民主化浪潮”(即“阿拉伯之春”),致使沙特等国面临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中东的政治骚乱到中亚的“颜色革命”,对中沙两国的政治安全均产生了影响。^② 中沙关系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双方都倡导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模式,对西方在阿拉伯地区推动所谓“民主改造”保持警惕。^③ 两国认为,各国政府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走自己的道路;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制度的好坏取决于能否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治国理政水平,他国应予以尊

^① Tanja A. B Börzel, “The Noble West and the Dirty Rest? Western Democracy Promoters and Illiberal Regional Powers,” *Democratization*, Vol. 22, No. 3, 2015, p. 519.

^② 田文林《西方对埃及的“和平演变”及其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43-62 页。

^③ Iain MacGillivray, “Maturing Sino-Saudi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Changing Dynamics in the Gulf,”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 31, No. 1, 2019, p. 74.

重。在维护海湾地区国家政治安全、预防局势动荡方面中沙存在共同利益。

第三,中沙一致认为应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中沙互不干涉对方内政,也反对他国干涉对方内政(尽管双方对“内政”的界定存在差别)。2016年8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中方牵头人张高丽在北京和时任沙特王储继承人兼第二副首相、国防大臣、中沙高委会沙方牵头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共同主持了首次会议,不干涉内政成为中沙双方的共识。穆罕默德表示,沙中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双方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和巨大合作潜力。沙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①

中国外交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反对外部力量对沙特国内政治指手画脚、肆意干涉。2018年7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主持召开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时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做与阿拉伯国家平等相待的真诚伙伴,决不干预阿拉伯国家内政,也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②同年10月,土耳其和西方大国一道炒作卡舒吉事件,甚至将之政治化和国际化,沙特国际形象严重受损。11月30日至12月1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穆罕默德王储克服外界干扰,如期举行双边会谈,双方达成了重要共识。习主席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沙关系,沙特保持稳定和发展是中东海湾地区实现繁荣进步的基石;沙特赞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和主张,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愿为促进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同中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作出贡献。^③两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缓解了沙特政府面临的国际压力,有助于中沙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

沙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反对西方干涉中国内政,促进了中沙战略互信。中国在新疆“去极端化”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却遭到西方的抹黑。2019年7月,沙特等37国常驻日内瓦大使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人权问题高级专员,支持中国政府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积极评价新疆人

① 侯丽军《张高丽和沙特王储继承人兼第二副首相、国防大臣穆罕默德主持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载《经济日报》2016年8月31日,第2版。

② 《王毅:中阿应坚定支持对方核心利益》,中阿合作论坛网站,2018年7月10日,<http://www.chinaarabcf.org/chn/zyhd/t1575747.htm>,登录时间:2020年3月25日。

③ 裴广江、刘旭霞《习近平会见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载《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日,第2版。

权成就和反恐。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拉·穆阿利米(Abdallah Mouallimi) 表示,“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比沙特更担心穆斯林的处境。我们支持中国在国内推动的发展政策”^①。2019年9月,沙特外交大臣阿萨夫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王毅外长时指出,沙特始终致力于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反对在涉疆问题上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坚定支持中方采取的正当立场和举措,愿同中方加强在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的交流合作。^② 沙特高度赞赏中国在新疆去极端化问题上所取得的成绩,反对西方借口民族与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第四,中沙共同倡导求同存异的国际关系准则。冷战结束以来,中沙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在务实合作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合作新领域。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逐步演变为一场代理人战争。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支持反对派,与西方政策一致,甚至推动阿盟终止了叙巴沙尔政府的代表权。中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已联合行使了8次否决权,与沙特的立场存在明显差异。但201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成功访问沙特,2014年时任沙特王储兼副首相、国防大臣萨勒曼成功访华,2006年1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沙特,两国高层往来频繁,并未受叙利亚危机的影响。中沙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源于两国对叙危机解决出路的认知差异,而非安全矛盾或利益分歧,并不影响双方的合作大局。

宗教交流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沙就中国大陆公民赴沙特朝觐达成共识。尽管中国朝觐一直运行良好,但中国政府主要从政治的高度审视朝觐,要求整团出境和入境,并将朝觐与国家安全、国家形象、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结合起来。^③ 长期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对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均保持警惕,但这并不影响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沙特与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等地区国家的关系均出现摩擦,甚至与伊朗和卡塔尔断交。2019年9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沙特外交大臣阿萨夫时表示,中沙是全面

^① 聂晓阳《37国大使联名致函联合国支持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积极评价新疆人权成就和反恐、去极端化成果》,载《解放军报》2019年7月14日,第4版。

^② 《王毅会见沙特外交大臣阿萨夫》,中阿合作论坛网站,2019年9月27日,<http://www.chinaarabef.org/chn/zyhd/t1702608.htm>,登录时间:2020年3月25日。

^③ Song Niu and Gamil Metwally, "Hajj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Vol. 10, No. 4, 2016, p. 60.

战略伙伴,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更加密切。中方支持沙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稳定所做的努力。^①中沙奉行务实合作政策,尽管具体外交政策不一定完全一致,但相互尊重对方,避免妄加评论。对于沙特率众卷入也门冲突,先后与伊朗和卡塔尔断交,以及因卡舒吉事件后与土耳其陷入纷争,中国都避免批评任何一方。与美沙在安全上形成了“中心—依附”的不对称关系不同,中沙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通过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合作共赢。

三、战略规划: 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路径选择

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形式不断多样的结果,其战略规划具有顶层设计、全球布局、机制对接和多维合作四个特点。

(一) 顶层设计

中沙领导人均高度重视两国的整体合作,通过频繁互访促进两国关系不断升级(见表 2)。中沙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审视双边关系,把握全方位合作的大局,带动了两国的整体合作。换言之,中沙合作关系的升级,主要是政治领导人自上而下主动塑造、积极引领的结果。双方元首建立了战略互信,通过“政治引领”推动全方位合作。政治引领表现为不同形式,如双方高层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元首特使以及沙特国王、王储、外交大臣等)互访,在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会晤,在重大事件发生后两国元首通电话、互相致电等。

表 2 中沙高层领导人互访一览表(1991 年~2019 年)

出访时间	出访领导人	会谈地点	访问成果
1991 年 7 月	国务院总理李鹏	沙特	中国总理首次正式访问沙特
1998 年 10 月	沙特王储兼第一副首相阿卜杜拉亲王	中国	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两国经贸混委会内成立 4 个工作小组的谅解备忘录
1999 年 10 月~11 月	国家主席江泽民	沙特	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沙特

^① 《王毅会见沙特外交大臣阿萨夫》。

出访时间	出访领导人	会谈地点	访问成果
2006年1月	沙特国王阿卜杜拉	中国	阿卜杜拉国王继位后的首次正式出访
2006年4月	国家主席胡锦涛	沙特	双方就加强两国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两国战略性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发展达成重要共识
2008年6月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沙特	双方签署了《中国和沙特关于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
2009年2月	国家主席胡锦涛	沙特	双方宣布将全面深化战略性友好关系
2012年1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沙特	原则同意成立中沙高级别委员会
2014年3月	时任沙特王储兼副首相、国防大臣萨勒曼	中国	进一步提升中沙战略性友好关系水平
2016年1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	沙特	中沙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16年8~9月	穆罕默德王储	中国	与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共同主持中沙高委会首次会议;赴杭州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2016年11月	习近平主席特使孟建柱	沙特	落实两国元首关于加强中沙安全领域的指示
2017年3月	沙特国王萨勒曼	中国	中沙签订14项合作协议
2017年8月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沙特	联合主持中沙高委会第二次会议
2018年11月	习主席与穆罕默德王储举行会谈	阿根廷	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
2019年2月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中国	出席中沙高委会第三次会议
2019年3月	国防部长魏凤和	沙特	加强中沙防务合作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整理而成。

2008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2016年1月,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中东便选择了沙特,两国元首发表了《中沙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共同见证了《中沙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开展产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产能、能源、通信、环境、文化、航天、科技等领域14项合作文件的签署。2017年3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华期间,中沙双方签署了14项谅解备忘录和合作意向书,其中包含两国推进的35个合作项目。

在双方领导人引领下,中沙合作从能源合作、非能源经济、人文合作向反恐

和安全等新领域拓展。近年来中沙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关系也日益密切。2017 年 3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访问沙特,同沙特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德进行了深入会谈。许其亮指出,两军在高层互访、人员培训和专业交流等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方愿与沙方一道,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两国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①同年 7 月,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驱逐舰长春舰、导弹护卫舰荆州舰、综合补给舰巢湖舰依次停靠吉达港,开始了为期 5 天的友好访问^②,这都是双方加强安全合作的重要体现。

(二) 全球布局

中沙均将对方视为重要的全球伙伴,在各自全球外交布局中加强国际事务磋商,发挥对方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形成议题联系,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整体合作。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沙特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欧佩克内部拥有重要影响力,双边合作具有全球影响。《中国与沙特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沙在许多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将密切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的协调与合作。双方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需要各成员国协商和平衡推进,通过达成最广泛的共识,寻求“一揽子”解决。^③中沙在联合国加强安全治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和世界卫生组织加强金融治理、经济治理和公共卫生治理等方面存在共体利益。

沙特是中东地区以及阿拉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东盟、海合会、欧佩克中处于特殊地位。2016 年 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期间,在利雅得会见了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亚德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扎耶尼。中国通过沙特这一“龙头”,提升了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海合会的整体合作关系,尤其是增强了中国与海合会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通信、电力、投资、金融、航天、核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① 《沙特国王萨勒曼会见许其亮:许其亮与沙特王储继承人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新华网,2017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7-03/31/c_1120734348.htm, 登录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② 苑生龙《“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沙经济合作建议》,载《中国经贸导刊》2017 年第 34 期,第 39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6 年 1 月 19 日,利雅得)。

有望早日达成中国—海合会自贸区。^①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中沙在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中加强磋商与合作,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成就。

中沙参与全球经济与安全治理促进了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使非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构建更加平衡的治理体系。2018年,沙特外交大臣朱贝尔表示,沙中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立场和共同利益,两国将在国际组织、非洲、亚洲开展三方合作。双方都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沙特欢迎中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并进一步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②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沙在第三方务实合作中具有潜力,如在非洲、巴基斯坦、东南亚和南亚。2018年,沙特是第一个受邀参与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国家。当年9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问巴基斯坦,巴总理伊姆兰·汗公开宣布,沙特愿意参与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从而使沙特成为参与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第三方伙伴。在访问巴基斯坦时,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宣布将投资200亿美元支持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以及炼油、石化、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等项目的建设,未来沙特还将持续扩大对巴基斯坦的投资。^③ 中沙在巴基斯坦的合作,成为东亚、西亚和南亚国家跨区域合作的典范,有助于亚洲国家的互联互通。

除产能合作外,在东南亚和南亚投资建设石化工厂,是沙特石油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沙特不断增加对东南亚的炼化项目投资,如投资马来西亚70亿美元共建炼化一体化发展项目;投资印度尼西亚40亿美元,对其原有的石化项目进行升级改造;对印度投资150亿美元,用于打造一家年产能6,000

① 杜尚泽《习近平会见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扎耶尼》,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20日,第2版。

② 《王毅同沙特外交大臣朱贝尔举行中沙高委会政治外交分委会第三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网站,2018年7月10日,<http://www.chinaarabcf.org/chn/zyhd/t1575596.htm>,登录时间:2020年3月25日。

③ 刘中民《西方对中沙合作想多了》,载《环球时报》2019年2月25日,第14版;Ejaz Hussain,“CPEC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c Implications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14, No. 1, 2020, p. 40.

万吨的炼厂。^① 中国是东南亚和南亚最大贸易伙伴,中沙在东南亚和南亚能源投资合作前景广阔。

(三) 机制对接

中沙双方通过建章立制,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落实提供制度保障,突出表现为通过建立副总理(副首相)级别的联合委员会促进双方发展战略的对接,使外交、商务、教育、文化等十几个部门能够实现功能对接、项目对接和战略目标对接。中沙合作的有序推进是双方领导人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双边合作的结果。两国政府鼓励各部门、地方和企业参与其中,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加强制度设计。中沙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不同,但都具有“强政府”的特点,政府可以通过自己掌握的行政和财政资源,塑造本国与对象国的合作关系。中国于 2017 年 6 月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沙特于 2016 年提出了“2030 愿景”和“2020 国家转型规划”。2017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时指出,中国愿同沙方一道,深化战略合作,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2030 愿景”的战略对接,通过两国高级别联合委员会机制落实好各领域合作。^② “一带一路”倡议将中沙联系起来,形成各领域之间的战略对接。

中沙高委会是两国政府间全方位、高层次、机制化的合作平台,发挥了重要的统筹协调作用,于 2016 年、2017 年和 2019 年先后召开过 3 次会议。2019 年 2 月,国务院副总理、中沙高委会中方牵头人韩正在北京会见了沙特王储兼副首相、国防大臣、中沙高委会沙方牵头人穆罕默德王储,并共同主持了中沙高委会第三次会议。韩正提出了中沙整体合作的四大领域:一是深化政治互信,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在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二是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 愿景”战略对接,深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财政金融、高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三是推进反恐和执法安全合作,加强去极端化经验交流;四是密切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韩正指出,中方欢迎沙方更多文化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国际文化合作机制。^③ 迄今为止,中国在中东地区已与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伊朗和阿联酋五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了相应的高级联合委员会,中沙高

^① 钱学文《当沙特愿景遇上中国倡议华锦阿美全面落地》,载《中国石油石化》2019 年第 7 期,第 48-49 页。

^② 《习近平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载《人民日报》2017 年 11 月 17 日,第 1 版。

^③ 郑明达《韩正会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并共同主持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载《光明日报》2019 年 2 月 23 日,第 2 版。

委会机制化建设走在了前列。

在中沙高委会下面,还下设了七个分委会,包括政治外交分委会(外交部牵头)、“一带一路”、重大投资合作项目和能源分委会(发改委牵头)、贸易和投资分委会(商务部牵头)、文化、科技和旅游分委会(文化部牵头)、财金分委会(财政部牵头)、安全合作分委会(公安部牵头)和军事合作分委会(国防部牵头),建立了中沙在七大领域的合作机制。2016年8月,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北京与到访的沙特内政部次大臣萨利姆主持召开了中沙高委会安全合作分委会首次会议;同月,中沙高委会“一带一路”及重大投资合作项目和能源分委会首次会议在北京召开;2018年7月,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同来华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的前任沙特外交大臣朱贝尔共同主持举行中沙高委会政治外交分委会第三次会议。

(四) 多维合作

中沙从以往的能源合作和政治合作为主,拓展至政治与外交、能源与“一带一路”、贸易与投资、文化与旅游、科学与技术、军事与安全 and 全球治理等多维领域,尤其是沙特提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建设核能与新能源城,为中沙在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机遇。《中沙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规定了双方在政治、能源、安全、人文、地区和国际事务等六大领域的合作。

经过30年的发展,中沙从能源合作伙伴、战略性合作伙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是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的结果。一方面,中沙在传统领域的合作得以巩固和拓展,同时在新能源、航空航天、防务、去极端化等领域的合作也日益密切。2017年沙特国王萨勒曼访华,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萨勒曼国王时指出,中国欢迎沙特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合作伙伴,也愿做沙特经济多元化的全球合作伙伴。中国是沙特可靠稳定的原油出口市场,双方应共同打造能源领域一体化合作格局,深化通信、航天等领域合作,探讨建立金融和投资合作平台,双方还应继续加强在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旅游、新闻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元首还见证了经贸、能源、产能、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①

首先,中沙能源合作一直处于“压舱石”地位。福建联合石化(2007年)、天

^① 李忠发、郝亚琳《习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举行会谈:一致同意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载《人民日报》2017年3月17日,第1版。

津炼化(2009年)、延布炼厂(2015年)、安宁炼油厂(2017年)、中沙吉赞经济城(2016年)等,是近年来中沙能源领域合作的重点项目。2017年中国已建成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一期4个项目,继续拓展舟山扩建、独山子、兰州、天津及黄岛洞库等9个基地,沙特对于中国石油储备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8》统计,2018年我国石油有71.62%依靠进口,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沙特对中国能源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①2019年2月,王毅外长在沙特《中东报》撰文指出,中沙确定了总金额约550亿美元的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中沙吉赞产业聚集区建设稳步推进,首个招商项目——总投资超过32亿美元的广州泛亚聚酯石化项目开工。^②沙特延布炼厂、辽宁盘锦炼厂、拉比格电厂、“大陆桥”铁路等一系列能源项目提升了中沙能源合作的水平。

其次,中沙双向投资取得新进展。2001年“9·11”事件后,美欧限制沙特人入境,对沙特与西方正常的经贸和文化往来造成了负面影响。沙特和其他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商人开始重视对浙江义乌的投资;中国商人在阿联酋、阿曼、科威特、沙特等海湾国家的人数不断增加,2010年中国商贸城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对外开业,该商贸城占地10万平方米,造价8,000万美元。^③沙特在“2030愿景”指导下“向东看”,以寻找稳定的能源和投资合作伙伴,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向西看”、实现优势产能转移的目标不谋而合。根据“2030愿景”,沙特将继续完善机场、地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建设,以促进国内非石油经济的发展。沙特拟打造海合会共同市场,完善沙特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公路和铁路网络,打通经埃及连接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道路。据沙特投资总局预测,沙特未来十年对公路、地铁、高铁、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估计将达1,410亿美元。^④

再次,中沙金融合作成为新领域。在经贸、能源、投资和金融领域,沙特积极

① 邢梦玥《“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中沙石油合作的探索》,载《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74-77页。

② 《王毅接受〈中东报〉采访》,中阿合作论坛网站,2019年2月25日,http://www.chinaarabcf.org/chn/zyhd/t1640588.htm,登录时间:2020年3月25日。

③ Sean Foley, “When Oil Is Not Enough: Sino-Saudi Relations and Vision 2030,”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11, No. 1, 2017, p. 111.

④ 李晓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投资推进》,载《江苏商论》2017年第12期,第42页。

“向东看”，同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加强政治、安全、经济和金融合作^①，并于2015年正式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沙特加入“亚投行”，带动了其他阿拉伯国家陆续加入。截至2020年初，埃及、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等7国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巴林、黎巴嫩、突尼斯、吉布提、苏丹、利比亚等8个阿拉伯国家也于近年加入“亚投行”。中沙还基于对等原则，互设银行代表处。201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沙特国家商业银行设立上海代表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已经在沙特设立分行。

最后，中沙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中沙人文交流涵盖教育、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宗教等多个领域，促进了两国的民心相通。1999年，中沙两国签署《中沙政府教育合作协定》。自2011年起，中国教育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共同举办“中国阿拉伯国家大学校长论坛”，该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为中国与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论坛上，共有来自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45所大学、部分国家高等教育部、驻华使馆文化官员，以及国内52所大学、研究机构参会，签署协议150多项。^②2019年2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华参加中沙高委会第三次会议时指出，沙特将汉语纳入该国所有教育阶段的课程之中，使沙特教育更具多元性。^③沙特对汉语的开放态度，促进了中沙人文交流。

在中沙人文交流中，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进展也很顺利。根据2016年中沙签署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对沙特塞林港遗址实施为期5年的联合考古发掘。2018年3月至4月，中沙联合考古队对塞林港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完成了遗址地表信息的收集、测绘与3D重建；探明了遗址的功能分区与埋藏状况，并从拓印的纪年碑铭准确推断出遗址年代为公元9世纪至13世纪，发现了宋元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外销瓷器残片，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④

^① Shirzad Azad, "Saudi Arabia Looks East: Imperatives and Implic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4, No. 3, 2019, pp. 139-152.

^② 王婷钰《“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沙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进展、问题及建议》，载《世界教育信息》2019年第20期，第27页。关于中沙人文交流，可参见田艺琼《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的人文外交研究》，载《阿拉伯研究论丛》2015年第2期，第146-160页。

^③ Jonathan Fulton,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Atlantic Council*, 2019, p. 9.

^④ 王波、涂一帆《中沙联合考古队开展对沙特塞林港第二次考古发掘》，载《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1期，第82页。

四、增量拓展：中沙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动力

作为与中国建交最晚的阿拉伯国家，沙特能够从中东地区强国中脱颖而出，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伊朗和阿联酋的关系处于同一层级），并建立全方位、整体性的立体多维合作关系，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主要有时代动因、安全动因和经济动因。

第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发展是中沙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动因。近代以来，每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会催生一批新兴产业，引发国际权力格局的调整与大国关系的重组。中沙整体推进合作关系得益于双方合作所处的时代变局。无论是沙特还是中国都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民族进步的重要标志，紧跟时代潮流，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尤其是以物联网、5G 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给中沙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从创新指数^①的角度看，沙特政府对创新产业投入较大，创新指数位列全球第 41 位，超过了意大利、波兰、土耳其和中国，但其创新产出指数仅位列全球第 98 位。^②

中沙从传统能源合作到政治合作再到全方位合作，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的结果。中国外长王毅指出，高新技术合作已取得初步成果，2018 年沙特成像仪搭载中国卫星发射，实现阿拉伯国家首次成功探月，中国长征运载火箭也成功发射了两颗沙特自行研制的卫星。^③ 中沙在北斗卫星、探月工程等太空合作领域已经签订了合作协议。

2016 年，中沙两国签署了《中沙卫星导航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加快推进北斗系统落地阿拉伯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2017 年 4 月，中国在利雅得成功举办北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研讨会，围绕技术交流和导航应用开展合作。同年，中沙签署了《关于中国嫦娥四号任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和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城主席图尔基亲王共同为月球图像揭幕，这是

^① 全球创新指数主要包括研发指数、政府承诺、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国家创新政策等。

^② Adnan Iqba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Saudi Arabia: An Overview," *Innovation: Management, Policy & Practice*, Vol. 13, No. 3, 2011, pp. 376-381.

^③ 《王毅接受〈中东报〉采访》。

中沙两国在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中继星任务国际合作项目取得的重要成果。^① 2018年12月,中国为沙特发射了沙特-5A和沙特-5B两颗遥感卫星,搭载发射10颗小卫星,卫星均进入预定轨道。这是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城自行研制、用于对地观测的两颗遥感卫星,也是沙特截至目前发射的自行研制的最大对地观测卫星。^② 在科技合作过程中,中国积极帮助沙特培训卫星导航、航空航天、核能等人才。2019年12月,中沙国家标准化合作技术培训班在四川成都召开。

在新能源领域,中沙高科技合作也具有重要潜力。2017年10月,沙特政府宣布“新未来”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5000亿美元,2025年以前将在靠近红海的亚喀巴湾东部地区建设由12座小城镇和大型工业区组成的高科技城市群。^③ 沙特的新兴工业化发展,对核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和创新城市的建设,中国的5G技术、港口、航空航天、登月计划、核电站、大飞机等技术的进步,都为双方在新时代促进合作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2017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来访的沙特国王萨勒曼时指出,中方愿同沙特巩固互信,深入对接发展战略,落实好重点领域的产能合作,开辟能源和高技术合作新空间,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调,推动中沙关系与广泛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④ 2019年2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陪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来华出席中沙高委会第三次会议的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贝尔时表示,世界各国都有发展的权利。沙特是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中方支持沙方多元化发展战略,愿意同沙方加强高技术合作,共同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他相信沙方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市场环境。^⑤ 中沙在高科技领域携手合作、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了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第四次革命的推动下,核能和太阳能是中沙能源合作的“新边疆”。在中沙传统能源合作中,沙特是输出方,中国是输入方;在新能源领域中,中国是输出方,沙特是输入方。中国是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出口国,沙特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刚

① 《中沙联合发布搭载相机对月成像图》,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网站,2018年6月14日,<http://www.cnsa.gov.cn/n6758823/n6758840/c6801913/content.html>,登录时间:2020年2月16日。

② 崔恩慧《“长征”二号D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沙特”卫星》,载《中国航天》2018年第12期,第29页。

③ 陈沫《沙特阿拉伯“新政”与中沙合作前景》,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8期,第56页。

④ 《李克强会见沙特国王萨勒曼》,载《经济日报》2017年3月18日,第2版。

⑤ 《王毅会见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贝尔》,中阿合作论坛网站,2019年2月22日,<http://www.chinaarabcf.org/chn/zyhd/t1640130.htm>,登录时间:2020年3月25日。

刚起步,目前以日本为主要合作伙伴,未来中沙两国合作前景广阔。除太阳能外,沙特还积极发展核能。根据沙特“2030 愿景”的战略部署,沙特将开发储量丰富的铀矿。中沙在铀矿开发领域将加强合作,并建立“中国+沙特+第三方”(如匈牙利、哈萨克斯坦)的合作模式。^① 2017 年 3 月,中核集团与沙特地调局签署了《中沙铀钍资源合作谅解备忘录》,前者计划在两年内对沙特 9 片潜力地区开展放射性资源勘查工作。^② 2019 年,沙特宣布建设 5G。华为宣布参与建设并签订合作备忘录,与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部、通信和信息化部、沙特电力公司、沙特能源公司 ACWA 等部门共同签署了 5 个共计 30 亿美元的项目,涉及智慧城市、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技术、电力、市政等行业。^③ 截至 2020 年,中沙在北斗、探月、核能、5G 等领域的合作,促进了中沙高科技合作。

第二,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剧烈变动是中沙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安全动因。近年来,中东地区安全格局剧烈变化,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充满不确定性,沙特成为矛盾的当事方,迫使其与域外大国包括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全方位合作。美国兰德公司将中国在中东的存在界定为经济上的高投入(economic heavyweight)、政治上的轻投入(political lightweight)与军事上的微投入(military featherweight)。^④ 近年来,中沙非传统安全合作尤其是反恐合作改变了这一态势。

首先,2015 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签订后,伊朗地区大国地位进一步凸显,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影响力上升。2016 年沙特率多国与伊朗断交,沙特与海合会其他国家、埃及和约旦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组建“阿拉伯版北约”——中东战略联盟,以应对伊朗的挑战。其次,以沙特、埃及、阿联酋、巴林为代表的“反穆兄会阵营”和以土耳其和卡塔尔为代表的“亲穆兄会阵营”严重对立,削弱了沙特在逊尼派阵营内部的主导权。最后,在能源政治领域,以沙特为代表的欧佩克与俄

① Robert Mason and Gawdat Bahgat, “Civil Nuclear Energy in the Middle East: Demand, Parity, and Risk,” *The 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April 11, 2019, p. 11, https://agsiw.org/wp-content/uploads/2019/04/Mason_Bahgat_Civil-Nuclear_ONLINE-1.pdf, 登录时间: 2020 年 5 月 25 日。

② 林春挺《中沙核能合作又迈出一步 中企极力向沙特推销四代核电》,第一财经, <https://www.yicai.com/news/5317911.html>, 登录时间: 2020 年 3 月 25 日。

③ 侯奇江《2019 年沙特部署 5G 华为签下近 30 亿投资项目》,财新网, 2019 年 2 月 24 日, <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9-02-24/101383044.html>, 登录时间: 2020 年 3 月 25 日。

④ James Kyngé, “The Red Star & the Crescent-Rigorous and Thought-Provoking,” *Financial Times*, April 30, 2018.

罗斯和美国形成战略博弈“大三角”，沙特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制约。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奉行“美国第一”的政策原则，不愿意为美国盟友如沙特、阿联酋、叙利亚库尔德人等“火中取栗”，甚至从叙利亚、伊拉克撤军，中东地区出现了俄进美退的局面。

近年来，海湾地区海上冲突时有发生，如也门冲突方对过往船只的威胁，阿曼水域油轮遇袭起火，沙特油田遇袭等。在2019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遭不明“无人机”袭击后，美国并未尽到协防沙特的义务，甚至因美沙石油战而引发矛盾。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5月宣布撤出部署在沙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及300美军，使沙特不得不寻求与中国等国家合作，避免在安全上完全依靠美国。

中国在海湾地区奉行“不结盟”政策，根据国际热点问题的是非曲直制定外交政策。2019年9月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遇袭后，习近平主席与沙特国王萨勒曼第一时间通电话，中方声明对沙特石油设施遭遇袭击予以谴责，认为这一事件给海湾地区局势和国际能源市场带来冲击，希望事件得到全面、客观、公正调查。^①2019年11月，中国海军舰队访问沙特吉达港，中沙宣布举行“2019 蓝剑”联合海军演习，演习地就设在红海沿岸吉达的费萨尔国王海军基地。此次联训是中国海军特战分队首次与沙特阿拉伯海军特战分队展开的联合训练。中国参训队员来自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沙方参训队员来自沙特皇家海军第二特战大队。沙特政府指出，此次联合军演旨在促进中沙两军之间的互信与友好关系。^②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国，中国的政治支持和外交宣示有助于沙特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也有助于中东海上原油运输线路的安全。中沙合作通过将经济联系与政治交往和安全合作联系起来，形成议题联系，促进了中沙关系的全面合作，做到“以经济促政治”和“以政治促安全”的全方位合作。

中沙两国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两国均明确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不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国家、民族、宗教和种族相联系。时任沙特情报总长图尔基亲王指出，2005年2月，沙特在利雅得召开全球反恐大会，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会。2005年12月，沙特在麦加召开伊斯兰国家反恐

① 《习近平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1日，第1版。

② 关亚斐《直击“蓝剑-2019”中沙海军特种部队联合训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http://www.mod.gov.cn/action/2019-12/02/content_4856072.htm，登录时间：2020年3月25日；Sinem Cengiz, “Saudi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the Post-Arab Uprisings Era: A Neo-Classical Realist Approach,” p. 65.

会议 在联合公报中 与会成员国一致谴责恐怖主义 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反对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种族和国家相挂钩。^① 这一立场与中方立场较为一致。2016 年 中沙特种部队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了一场代号为“探索 2016”的联合军事演习 双方数十名反恐特种兵参加。^② 这是两国首次举行反恐联演 也是世界大国与中东国家建立反恐合作网络的重要标志。

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剧烈变动还促进了中沙防务合作。美国是沙特军火的主要供应商 中沙防务合作尽管已经起步 但是交易额有限 中国对沙特军火销售旨在增强其防御能力和反恐能力 维护国家安全。2019 年 3 月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访问沙特 与沙特国王萨勒曼、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魏凤和指出 中沙两军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取得很多务实成果。中方愿与沙军一道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 拓展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新的发展。^③

第三 产业互补性是中沙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经济动因。沙特有雄厚的主权财务基金 中国有齐全的工业门类和先进的制造业技术 双方在经济、能源、政治领域形成了强互补性与弱竞争性 为实现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创造了天然条件。正如 2016 年 1 月习近平在沙特《利雅得》报上撰文指出的: 中沙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 中国公司在圣城麦加铺设的轻轨项目为来自全球的穆斯林朝觐者提供了便捷服务。^④ 从中沙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来看 沙特对华贸易依存度较高; 中国对沙特的贸易依存度也不低; 从产业内贸易度量指数来看 中沙只有个别产品类别在某些年份出现了产业内贸易现象 大多数产品类别在大多数年份都显示出较弱的产业内贸易特征 而显示出较高的产业间贸易特征^⑤ 充分体现了双边贸易的互补性。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 在经济多元化发展中 形成了优势产能 成为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国家。在世界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 有 220 多种工业产品中

① HRH Prince Saud Al-Fais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Fighting the Terrorist Threat,” *The RUSI Journal*, Vol. 151, No. 1, pp. 45-46.

② Yoel Guzansky and Assaf Orion, “Slowly but Surely: Growing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China,” *INSS Insight*, No. 891, January 29, 2017, pp. 1-2.

③ 涂一帆《沙特国王萨勒曼、王储穆罕默德会见魏凤和》,载《解放军报》2019 年 3 月 28 日 第 2 版。

④ 习近平《做共同发展的好伙伴》,载《利雅得报》(阿拉伯文) 2016 年 1 月 18 日 第 1 版。

⑤ 李晓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沙特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载《学术探索》2018 年第 4 期 第 54 页。

国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① 在中国现代工业生产过程中,石油和天然气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中国“保增长、稳就业、拉动出口”的基础。2019年1月至5月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原油占总进口量的47%,沙特与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量基本持平。^② 沙特在“2030愿景”中也提出经济多元化战略,通过摆脱对石油财政的依赖,大力发展工业化和新兴产业,为中沙优势互补、加强产能合作提供了机遇。2019年2月22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访华,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指出,沙特视中国为重要战略伙伴,感谢中国对沙特国内改革和发展的支持。沙特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愿将沙方“2030愿景”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的务实合作。^③ 在传统能源领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沙特出口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量的1/6),沙特是世界上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石油进口占沙特出口量的1/7),双方在上游和下游油气合作方面进展迅速。同时,沙特希望摆脱“地租经济”模式,走能源结构多元化道路。在新能源领域,沙特希望成为核能大国、掌握民用核技术,中国则已掌握先进的第四代核技术,有利于双方在传统能源合作的基础上进行新能源合作。

沙特经济转型发展促进了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2005年沙特建设阿卜杜拉经济城,该城建设费用达270亿美元。建成后,将产生50万新就业机会,使沙特男性失业率下降15%。^④ 2016年,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130美元降至每桶30美元,沙特政府财政赤字陡增,国内能源补贴增加了政府负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沙特不能采取开源节流的措施,其外汇储备会在五年内耗尽。为此,沙特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包括从石油经济到石油与非石油经济并存,从国有企业转向企业私有化,从政府主导投资到大力吸引外资,从雇

^① 《我国已成为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1日,第4版。

^② 《简析2019上半年中国进口原油来源地的变与不变》,搜狐网站,2019年7月15日,https://www.sohu.com/a/326946699_559891, 登录时间:2020年5月25日。

^③ 赵成《习近平会见沙特阿拉伯国王王储穆罕默德》载《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第1版。

^④ Ben Simpfendorfer, *The New Silk Road: How a Rising Arab World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West and Rediscovering Chin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45, 112.

佣外国劳工到雇佣本国劳工。^① 沙特经济转型为中国优势产能转移提供了机遇,其中包括以能源为基础的产业(包括石化行业、净化水与发电业、冶金行业三个方面) 交通运输业(包括铁路、港口、码头、道路等)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是沙特优先发展的行业。沙特政府还计划建设能源城、经济城和工业区等促进经济转型,如建设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麦地那经济城、吉赞经济城、哈伊勒经济城、塔布克经济城、阿赫萨经济城以及朱拜勒和延布工业区。^② 中国可以发挥基建优势,促进沙特的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

五、战略谋划: 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

经过双方的共同探索,中沙整体合作体系已经形成。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无论是中长期发展战略对接,还是各部委在联委会框架下加强项目对接以及政治对话与防务合作,抑或是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框架内参与全球治理,中沙合作都实现了机制化。展望未来,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中沙须处理好两组“三角关系”。中沙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中国—美国—沙特”大三角和“中国—伊朗—沙特”小三角。就“中美沙”大三角而言,21世纪以来,沙特对外政策实际上寻求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二分法”,即安全上依靠西方,经贸合作上依靠东方。尤其是在防务方面与美国维持军售关系,在能源出口、投资与贸易领域同中国、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等方面,沙特一直是安全合作“向西看”,经贸合作“向东看”。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沙特开始打破这种传统的“二分法”,在与中国夯实能源、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同时,开始加强双方在政治、军事和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沙特这一政策有助于中沙整体合作关系的构建。中国在中东奉行不结盟、不填补权力真空、不参与代理人战争的政策,在沙特和伊朗、亲西方的“中东战略联盟”和反西方的“抵抗联盟”之间保持平衡。

中沙关系的升级不会影响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如果说美沙特殊关系主要基

^① Mo Chen, “The Economic Adjustment of Saudi Arabia and the Docking of Bilateral Economy an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audi Arabia Unde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Vol.10, No. 2, 2016, pp. 46-48.

^② 刘磊《中沙经贸合作现状及前景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53页。

于二战结束以来双方“以石油换美元”的特殊关系,属于沙特外交的“存量”,那么,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则是一种“增量”,基于发展战略对接。中国无意在沙特排挤美国和欧洲大国的影响力,而是希望与西方建立互补关系,甚至寻求在域外大国之间开展磋商与协调,避免西方对沙特的胁迫。^①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在军事上从中东抽身,从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区撤军,对沙特的安全承诺减少。这些变化迫使沙特不得不寻求大国平衡政策,兼顾“向西看”与“向东看”,依靠西方尤其是美国维护安全,依靠亚洲大国维护稳定的能源供需关系。

在“中伊沙”小三角中,沙特认为伊朗的威胁是全面的,它既威胁到了沙特政权安全,又削弱了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权。沙特认为伊朗通过武装什叶派力量,实际上对阿拉伯世界“分而治之”,破坏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与统一;伊朗则认为沙特不应干预其与阿拉伯国家的正常交往。中国对沙特、伊朗和中东其他大国的不结盟政策绝不是消极、静态的“等距离外交”,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中东热点问题的是非曲直采取灵活政策,中沙推动整体合作的空间很大。因此,沙特试图利用其与中国不断增强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影响中国对伊朗政策,限制伊朗在地区的权力投射^②,特别是在伊拉克、也门、巴林、黎巴嫩和叙利亚。中国主张海湾国家求同存异、和平共存,对于沙特和伊朗缓和局势的做法,均表示欢迎。

其次,中沙须处理好双边与多边的关系。迄今为止,中沙整体合作主要以双边为主。同时,“中阿合作论坛”、联合国、二十国集团成为中沙合作的多边舞台。“中阿合作论坛”自2004年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整体合作最重要的多边载体。展望未来,需要将中沙关系置于中东国际关系、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大背景下去审视,使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引领中阿整体合作的“样板”。2018年7月,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阿经过平等协商,一致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多边层面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仍然需通过双边关系去落实。沙特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需要在今后中阿合作论坛多边机制化建设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实现沙特主权财富基金与中国的“中投”、丝路基金、亚投行的

^① Naser M. Al-Tamimi, *China-Saudi Arabia Relations, 1990-2012: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or Strategic Alli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35-36.

^② Iain MacGillivray, “Maturing Sino-Saudi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Changing Dynamics in the Gulf,”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 31, No. 1, 2019, p. 63.

有机结合。在二十国集团中,中沙等非西方大国需加强合作;可建立上合组织+海合会、金砖国家+海合会等区间组织合作关系。^①在政治上,沙特曾率先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投票中,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与阿拉伯国家和沙特始终站在一起。在中东和平进程多边机制中,中沙也需要在多边机制中加强合作。在投资领域,中沙还可以探索第三方合作的新范式,如在东南亚、南亚、中巴经济走廊、非洲等。

再次,中沙应平衡好旧平台与新机制的关系。时至今日,能源合作仍然是中沙合作的重中之重;原有的合作平台,尤其是中沙高委会机制下的六个分委会是重要双边平台,“中阿合作论坛”是最直接的多边平台。同时,随着中沙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双方在实际中遇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也会随之增加,中沙双方需要新思维,探索新机制。沙特国王萨勒曼在 2017 年 3 月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 35 个项目,合同金额 650 亿美元,这些项目涉及海水提铀技术研究、铀钍矿资源勘探、无人机制造、沙特参与中国“嫦娥四号”、高温气冷堆项目联合可行性研究合作等高新领域。^②未来,围绕北斗、探月、5G、核能、太阳能等,中沙势必建立新的合作机制。

最后,中沙应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当前,无论沙特还是中国都在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统筹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也都面临社会多元化、阶层分化、民生改善和推动治理现代化的挑战。习近平指出“和平、改革、发展是中东各国的普遍需要,稳定、安宁、幸福是中东人民的共同追求。”^③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属于沙特王室第三代,有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的决心;中国近年来改革不断升级和提速,两国均在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一方面,中沙可分享“去极端化”经验。2019 年中国外长王毅在接受沙特《中东报》采访时指出,中国在加大对恐怖组织打击的同时,充分借鉴包括沙特在内的国际社会反恐和去极端化经验,在新疆依法开设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这是一种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创新举措,也是中方为国际社会开展反恐斗

^① Talmiz Ahmad, “Promoting SCO-GCC Partnership: Shaping and Pursuing an Indian Initiative,”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12, No. 4, 2018, pp. 421-437.

^② 陈沫《沙特阿拉伯的工业化与中沙产能合作》,载《西亚非洲》2017 年第 6 期,第 156 页。

^③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11 日,第 1 版。

争作出的有益探索,在本质上同沙方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是一致的。^① 沙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去极端化”教育转化中心,在沙特的提议下,联合国成立了专门的反恐中心以交流反恐信息、建立协调机制,沙特政府捐款1亿美元。^② 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所指出的,中沙都是恐怖主义受害者,也都是国际反恐合作的重要参与者。我们在反恐和去极端化问题上存在诸多共识,都主张加强文明对话,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和宗教挂钩;都坚持反恐应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反对采取双重标准;都认为国际反恐合作在坚持联合国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应当多倾听恐怖主义受害国的声音。当前,国际和地区反恐和去极端化形势依然严峻。中国愿同沙特开展政策对话和情报信息交流,在技术合作和人员培训、阻断涉恐融资来源、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去极端化经验交流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维护好共同安全。^③

另一方面,中沙可交流经济社会改革成果。中沙实现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新兴大国探索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近年来,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南非等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各种挑战,其现代化发展模式受到西方怀疑。2019年2月,习主席在会见来访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时指出,中方坚定支持沙方推动的经济多元化和社会改革,坚定支持沙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所做的努力。^④ 中沙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交流经验,有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振兴和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也有助于多边主义发展和亚洲认同的强化。

六、结语

建交30年来,中沙关系持续升温,层级不断提高,并最终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存量不断夯实,增量不断拓展,这与两国政府“整体对接”有很大关系。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市场和技术优势,也是世界政治大国。沙特作为中等强国,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主权财富基金,这成为其硬

^① 《王毅接受〈中东报〉采访》。

^② 李金祥、孙晓光《联合国反恐中心成立的背景及影响》,载《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6期,第6页。

^③ 《王毅接受〈中东报〉采访》。

^④ 赵成《习近平会见沙特阿拉伯王国王储穆罕默德》。

实力;沙特还是伊斯兰世界两座圣城的守护者,在全球穆斯林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这成为其软实力。中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两国外交的优先任务不同,但双方在能源、经贸、科技、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的互补关系促进了两国战略对接。能源合作与经贸合作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压舱石”,是建交 30 年来中沙关系的重要“存量”,也是合作基础;新能源、航空航天和高科技是“增量”,是双方合作的“新边疆”。中沙着眼于未来,谋篇布局,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整体推进,是 30 年来中沙战略合作关系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

中沙整体合作超越了地缘经济合作的范畴,通过议题联系建立了全方位合作关系,为中国探索与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朗和阿联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案例,也为沙特发展与日本、印度等亚洲大国的战略关系提供了思路,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的重要案例。随着美国页岩油革命,西方从沙特购买的能源产品日益减少,美俄沙在石油出口方面形成了竞争关系;地区热点问题新发展与地缘政治争夺进入新阶段,中东在奥斯曼帝国解体近一个世纪后,进入“百年变局”。亚洲大国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日益成为沙特石油的主要买家,双方形成了相互依存的能源合作关系,进而升级为政治合作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了海合会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集体合作。

总之,中沙分别处于亚洲的东部和西部,两国的整体对接不仅可以带动“中阿合作论坛”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设,而且有助于亚洲共同体意识的强化。二战结束以来,受西方强势话语的影响,西亚北非形成的“中东板块”,与亚洲和非洲板块并列。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将促使西亚国家群体“向东进”和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向西进”,深化和拓展双方的全面战略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西亚有望重新回归“亚洲大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成为亚洲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快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跨区域互联互通,实现亚洲国家的整体性崛起。

(责任编辑:李意 责任校对:包澄章)

Abstracts

03 Rethink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from Mediaeval to Modern Times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in the mediaeval times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accompanied by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s not only a long conflict with religious color, but also left many beautiful stories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different religions, which however, has been covered by conflict narrative. In modern times, rejection and escaping, secularism and Westernization, Islamic modernism and nationalism constitute the four forms of Islam's response to the West. In this process, Islam's response to the West was not simply to contain, resist or exclude. Firstly,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 Eastern nationalism and Isla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existence of various forms of relations between Islamic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Secondly,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s and their social forces have complex and diverse responses to the West, rather than simply anti-Western. Finally, this paper draws two conclusions: First, the narrative them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needs to be rewritten urgently, needing to get rid of the one-sided narrative of highlighting conflict and looking down upon cooperation at present. Second, the conflic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exist objectively, which is neither a religious conflict nor a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Islam and the We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Civilization Intercourse

Author LIU Zhongmin, Ph.D., Professor,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8 Overall Integration: On China-Saudi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bstract Saudi Arabia is rich in oil and gas resources with capital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while China is rich in human resources with technical and market advantages. In the 3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they have transcende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energy partners, strategic friendly partners and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 forming an integrated and interdependent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 line with Saudi "Vision 2030".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affected by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Middle Eastern geopolitical rivalry and complementarity of China's and Saudi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Such partnership is characterized by top-level design, mechanism docking,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and global outreach. In prosp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audi relations needs to address the greater triangle of "China-US-Saudi Arabia" and the lesser triangle of "China-Iran-Saudi Arabia", coordinating the old platform and the new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the exchange of governance experience between China and Saudi Arabia. Th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audi Arabia has promoted the interconnection of East Asia and West Asia, and it has helped major Asian countries to explore a modernization path that suits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conditions, thereby enhanc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Asian community.

Key Words China and Saudi Arabia; Integral Cooperation; China's Middle East Diplomacy; Emerging Powers

Authors Sun Degang, Ph.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 Wang Yaqing , Ph.D. Candidate ,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55 The Impact of *Hajj* on Sino-Saudi Relations

Abstract *Hajj* is not only the religious obligation of Muslims all over the world , but also a significant factor that has impacted on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other countries where Muslims live. *Hajj* has played a role as a l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Saudi relations. *Hajj* has played the roles of “lifeline” “pioneer” “lubricant ” and “new frontier” in four historical stages. On the whole ,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Saudi Arabia started from the simply religious field to the religious and non-political fields , and finally involved many fields such as politics , economy , military , society and culture.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 *Hajj* gradually returned to the religious essence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Only when the two countries cooperate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Hajj* can the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global *Hajj* governance and the strategic docking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ina and Saudi Arabia.

Key Words *Hajj*; Sino-Saudi Relations; Bandung Conference; Deng Xiaoping’s visit to the U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uthor Niu Song , Ph.D. , Professor ,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Research Fellow ,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 Fudan University.

76 A Review on Saudi Arabia’s Economic Reforms Under the King Salman

Abstract Saudi Arabia’s state-dominated and oil-based economy led to the lack of independence in development of its non-oil industry and private sectors characterized by reliance on subsidies , monopoly of family business , and over-reliance on foreign workers. Since the King Salman took office , the Kingdom has undertaken a set of economic reform measures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privatization ,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expanding sovereign-wealth fund investments , however , economic reform is still constrained by man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n the one hand , interior factors such as royal family politics and its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 mismatching between the skills of employed population and the needs of the labor market ,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inertia of rentier economy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reform , and vested interest groups’ obstruction of the reform process are hin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On the other hand , Saudi Arabia is faced by external factors in the reshaping its own economy and establishing a new social contract , includ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among Gulf monarchies , continued oil market turmoil and chain effects of regional incidents.

Key Words Saudi Arabia’s Diplomacy; King Salman; Emerging Middle Powers; Vision 2030

Author LU Yiwei , Ph.D. , Associate Professor ,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99 Dynamics of Family Politics in the Shift of Saudi Arabia’s Foreign Policy

Abstract Since King Salman took office in 2015 ,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has changed its traditional role as a mediator and launched a series of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offensives in the Middle East. Meanwhile , power struggle within the Kingdom’s royal family continues. As an absolute monarchy , Saudi Arabia’s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ng Salman’s foreign policy making and royal politics is manifested in fierce political game around